

# 從場域、資本角度論析《三國演義》中 蜀漢的幻滅

李艷梅\*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摘要

綜觀《三國演義》中蜀漢的幻滅，共有三個致命的關鍵因素：一是劉備不顧孔明與趙雲等的勸阻，執意揮兵進攻東吳以報關羽之仇，二是劉備死後，劉禪即位後的蜀漢集團價值系統的改變，三則是曹魏勢力的入侵，這三項重要的原因，可說導致了蜀漢逐漸走向無可避免的幻滅的命運，本文從場域與資本的角度析論蜀漢幻滅這三大因素，所導致蜀漢在資本與場域中位置變化，所產生的致命結果。

**關鍵詞：**三國演義、蜀漢、場域、資本、劉備、關羽

---

\*聯絡方式：ymlee@mail.nhu.edu.tw

## 一、前言

《三國演義》是一部中國著名的小說經典，對於它的研究與詮釋，可說其來已久。自來多半均以文本內容結合歷史的角度來進行，或者對人物性格詮釋，或者對政治文化與智慧的講究等，均有不同的研究成果。筆者以為，無論在經典的詮釋，或經典的講授上，倘若能針對文本的特性，以相關的理論觀點進行參照與詮釋，相信必能豐富對此經典的解讀。本文試圖以布爾迪厄「場域」「資本」的理論觀點與視角來進行解讀，希望能在文本的敘事現象中，有一個系統性的整合與觀察。

「場域」(field)一詞，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術語，它在哲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等領域中，都曾被提及和討論，而在不同的脈絡中，被強調的重點與內涵亦有所不同。在當代的社會思想家中，則以法人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 - 2002)的觀點最具開創性意義。他針對傳統西方去理解人的存在處境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兩大研究向度，及歷史主義和結構主義研究上的侷限，而提出一不同以往的思考。布爾迪厄即曾云：

場域觀念本身就表明我們超越了結構同歷史，保守同變革之間的傳統對立。<sup>1</sup>

布爾迪厄對場域的相關思考，雖來自對西方學術的反省，但運用至文學研究時，他的理解方式和向度，能有效地幫助我們對文本中的人物存在世界，有更豐富的詮釋與觀察。

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並不是一個純空間的想法，而是要和「位置」、「資本」及「習性」(habitus)的概念，結合在一起理解。他並不去框限或界定場域的界線，因為它是隨時會變動的，對場域進行觀察，即是先對人所處的「關係」和「位置」來做優先的理解。布爾迪厄即這麼為場域做解釋：它「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sup>2</sup>所以，存在某一場域的人，即因所處的獨特位置，和彼此之間的關係，而讓這個場域成形；換一個角度來說，也就是因為所處的位置不同，人因此而擁有了不同類型的權力和資本，所以，它們之間便形成了支配關係、屈從關係，或者是一種結構上的對應關係。因此，從「場域」概念進行的思考，就是從「關係」的角度進行的思考。在此基本的理解前提下，個人的行為則「自然的」存在於這個生活世界中，這也就是布爾迪厄所說的「習性」(habitus)的概念，人們在「場域」中既顯露了自身的性情系統，也暗藏著社會文化系統所加諸其上的影響，所以在既看似主觀又是客觀的實踐行動中，便形成了「場域」內的特殊文化和價值。

<sup>1</sup> 引自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等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頁一二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

<sup>2</sup> 同注1，頁一三四。

把「場域」、「資本」和「習性」三者的關係作一個簡單的綜合表述，即是：習性有助於把場域建構成一個有意義和價值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投資精力並積累了有效的資本。<sup>3</sup>

以場域的概念，頗能有效地說明蜀漢之所以敗亡的原因，無論就蜀漢擁有的資本的變化，以及位置的改變等，均能解讀出蜀漢敗亡的真正原因。筆者之前曾以場域的概念與角度來探討蜀漢的崛起<sup>4</sup>。從場域的概念來看，蜀漢崛起的重要因素在於掌握血統與仁德的正統性資本，以及以「義」結盟的人和資本。劉備集團後來的經營與發展都是順此兩大方向在進行的，在充實人力與擴張領土上都因此有了很好的成績。循此方向來思考，蜀漢的走向幻滅，是否意味著原有的資本不再？或者是產生了質變？以致於影響至他的危亡存續？本文在此思考理解的前提下，擬針對蜀漢的敗亡，作一結構性的析論。

探究蜀漢的幻滅，吾人可見其中有三個致命的關鍵因素：一是劉備不顧孔明與趙雲等的勸阻，執意揮兵進攻東吳以報關羽之仇；二則是劉備死後，劉禪即位後的蜀漢集團價值系統的改變，三則是曹魏勢力的入侵，這三項重要的原因，可說導致蜀漢逐漸走向無可避免幻滅的命運。然而，我們要探究的是，這三項因素，是如何地在天下場域中，以及蜀漢集團發揮作用，使得蜀漢在天下場域的資本逐漸淪喪？而這又如何使得蜀漢原有所處位置的優位性喪失，終而被曹魏集團完全兼併？

本文即在上述的理解立場上，探究蜀漢幻滅之成因。在論述過程中，即以場域與資本的概念作為觀照的大方向。

## 二、家庭場域價值與天下場域價值的衝突——劉備執意為關羽復仇

《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在天下場域中競逐，天下場域的邊境也於焉成形。人們也都在價值系統上，依循著天下場域的行事價值與邏輯來彼此角力，以尋求最好勝出的機會。然而，此中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天下場域的價值與家庭場域的價值系統卻是一種互斥且相互衝突的關係。天下場域強調「忠」的價值意義，而家庭場域則有著「孝悌」倫理價值系統，事實上，這兩個價值系統都是因應著「君」與「父」這兩個對象上的考量而有的倫理價值，他們展現了一個共同特色，那就是他們都有一個必須要歸順服從的對象，藉由這個順服效力的過程與忠孝價值的肯定，使得這一套家國宗法父權的體制能夠穩定地維持。在家庭與天下這兩個不

<sup>3</sup> 參皮埃爾·布爾迪厄著，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頁一七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

<sup>4</sup> 筆者之文「從場域的角度看蜀漢的崛起——《三國演義》的價值系統與資本運作研究」，登載於《荊州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一期。

同的場域中，這一套價值系統自可各自運作著，然而，當在天下場域中競逐時，要有效地為自己的資本累積，便只有更集中在與天下場域相關的價值及運作規則上，因為原初人們之所以進入此場域中，就是因為相互之間有了競逐關係及相關資本，這也是天下場域成形的界線之所在，因此，懷藏著天下場域的價值觀及視野，自然就會在此中獲得較大的利益和發展。

所以，因著各自歸順服從的對象均具有獨一性，家庭場域的倫理價值與天下場域的倫理價值在實踐中是彼此互相衝突的，也因此，天下場域的價值系統才會有對「移孝作忠」「忠孝難兩全」觀念的強調，在此觀念之下，人們僅能遵從天下場域的價值原則，若違背此原則，即意味著在此場域中競逐資本的流失，自然會給自己帶來不良的發展。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才智次於孔明的隱士徐庶，徐庶在毛遂自薦為劉備效命，欲在天下場域中有一番作為時，曹操利用他看重「孝道」的價值觀，而將其母親虜獲，偽造其母字跡將徐庶賺至許昌，徐母以「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第三十七回)相責並以自縊明志。徐庶為全其人子之孝道變換陣營，使得他在天下場域中自廢武功，從此消聲匿跡難以再有發展。

而在天下場域中發展的人，若生命的重心是擺在家庭價值，或者按此價值行事，往往亦會導致無可挽回的後果。以曹操陣營與東吳陣營而言，都曾因此而誤了集團的發展，例如曹操在剛崛起時，為報殺父之仇而下令血洗徐州，因此為他帶來殘酷的名聲，使得爾後的發展因此而受影響；而孫權則以「美人計」在將劉備誘至東吳作人質以交換荊州時，就因母親吳國太的介入，孫權因「孝」之故不敢違逆，而使得這個計謀功敗垂成，錯失了可以挾制劉備集團的機會，使得劉備集團蓄積能量得以進一步發展。至於劉備集團則是在實力穩定，佔據有利位置之後，因劉備結拜兄弟關羽為東吳所殺，而傾全部之國力攻吳以報兄弟之仇，此因兄弟之情從「悌道」而採取的行動，讓蜀漢的實力從此大傷，無法挽回。相較於其他兩個集團，蜀漢的損失可以說是最大的了，因為，這可說是劉備集團走向幻滅的第一個重要因素。

就這項導致蜀漢敗亡的第一因素而言。早先，劉備集團以「正義之師」的理想形象存在於天下場域之中，初始結盟的核心人物劉備、關羽和張飛，以異姓兄弟的關係成為最親近的奮鬥伙伴。這也是劉備集團興起的重要資本，此以義結盟的兄弟關係，讓蜀漢集團擁有了一個「以義為上」的人和關係，它可成為初始集團茁壯的力量與資本，也因著這股力量與精神價值的號召，一些賢才志士方才會被吸引至劉備集團之中。是以，早期的盟誓有著極大的動力與意義，它代表著異姓結盟的一種力量與形式，然而，待到劉備集團自成一國，因著曹丕的篡漢自立，劉備集團亦在此時稱帝以延續漢室正統，此時蜀漢在天下場域中的「位置」已經有了改變。從原來藉由宣示正統與仁德之主來吸納人才，佔據據點為奮鬥目標的集團存在，到國家規模的確立，進而與曹魏之國正式對立。

這種改變的意義在於他已朝向一統天下的目標，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而成為蜀漢一國，亦宣示著「正統」延續的具體實踐。所以此時的經營重點，應是要

逐漸蓄積蜀漢原有的資本力量，以向一統天下的目標邁進，而不應是罔顧情勢地進攻他人，特別是共同面對強大的曹魏集團而有著唇齒關係的東吳。

就蜀漢所處的天下場域的位置而言，對於孫權與曹操集團，因曹操陣營勢力最大，所以，蜀漢一直以來採取的策略就是「東和孫吳，北抗曹操」，而事實上，東吳也採取了相同的策略，他始終維持著與曹操和劉備一定距離的中間位置，也因此，荊州之事方才藉由談判，延宕了許久而未解決。而東吳在奪占荊州殺了關羽之後，即已藉由各種方式請罪以避免劉備為弟復仇，如送孫夫人歸，以及縛還降將，歸還荊州等舉，希望能「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第八十二回），然而這些都無法遏止劉備夾著憤怒之火的進攻。東吳的妥協，並不意味著東吳沒有這份力量來與劉備相抗衡，而是以天下局勢而言，蜀漢與東吳若開始交戰，對雙方均極為不利，曹魏在此隔岸觀虎鬥，曹丕的認知最為真切：「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第八十二回）如此攸關自身存亡及天下局勢轉變的事，東吳體認地十分清楚，這也是東吳極力想說服劉備的緣故，甚至還使出遊說曹丕出兵襲蜀漢的計謀，好讓劉備班師回朝。

然而，這些均是劉備無法體認到的，或者，他已無暇顧及，劉備已無法察知蜀漢集團的位置，已與當年興起時不同。他也無法體認到，家庭場域價值僅能作為發展時的一種結盟力量，但它終究不能成為天下場域的行動者決策時，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基於以上種種的錯估，劉備第一次不聽從孔明的建言，即便連趙雲進而以大義說之，並強調了天下場域的形勢：

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兇逆 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願以天下為重。（第八十一回）

此話也無法入耳，劉備則仍從家庭場域的悌道原則以「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揮兵攻吳。

劉備此舉，正是他即帝位之後的首要之事，於時於勢均極為不智，誠如秦宓所言：「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第八十一回）這種充滿了復仇之火的戰爭，也注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此誠如毛宗崗評：「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虢亭之兵，憤兵也。驕兵敗，憤亦必敗。」劉備以憤怒之火發兵，又繼之以驕兵之態，輕忽東吳的年少將領陸遜，而率以錯誤的軍事佈局逕自為之，不與孔明相商。這場戰役最後不僅慘敗，而且耗損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基業。

### 三、蜀漢宣示資本的喪失 領導核心的質變

蜀漢在興起及強盛之時，均極為善用他的「正義之師」的資本，並以此逐漸壯大，劉備集團在彝陵大戰失敗之後，劉備旋即死亡，這個象徵著「正統」與「仁

德」之主的劉皇叔死亡之後，由嗣子劉禪即位，劉禪是個昏蒙愚昧的少主，當劉備託孤時，即千萬請孔明善加輔佐，劉備以厚恩以結孔明，要求自己兒子「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第八十五回）之外，更直接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王。」（第八十五回）之語，向孔明強調自己無私的心，劉備此舉可謂是高明的託孤，因為其中有著不避嫌的表露，又有著對一國支柱的信任。多重因素，使得孔明再三以「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第八十五回）來表白自己的忠心至死。孔明在劉備死後，仍延續著蜀漢「忠義」的精神，所以因著劉備而集結於蜀漢陣營中的這些追隨者，以孔明為首，均以「責無旁貸」「受先主之恩」的心情，繼續著蜀漢的目標。

在劉備剛亡故的那段時間，小說的敘述：「卻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八十五回）藉此強調了兩個重點，一是隨著舊臣的病亡，原有的人和基礎產生了變化的可能，二是孔明成為蜀漢集團理想的主要實踐者。此處我們仍應注意，在蜀漢的權力分佈上，即使孔明的政治用兵實權很大，然而，在為蜀漢效忠的前提下，蜀漢之主劉禪仍佔據了最具實權的關鍵位置。而對於蜀漢原先擁有的資本及所朝向的目標，蜀主劉禪不但沒有興趣，也無心經營，所以對他而言，他只要安坐在皇帝之位上，享盡帝王生活的富貴榮華即可。但逐漸地，因著他的昏昧無能，他開始成為蜀漢集團的衰敗力量。

首先，在孔明的第四次出祁山時，因著曹軍用計，散佈不利孔明之流言，使得昏昧的劉禪聽信宦官之言，對孔明領兵在外產生了不信任，蜀漢集團原有的理想的君臣關係，在此開始「質變」。劉禪基於孔明有可能將影響自己的皇位這樣私利的考量，對於孔明在即將獲得有利戰績的關鍵時刻，將他召回，準備削其兵權，免生叛逆。彼時孔明則歎曰：

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後再難得此機會也。（第一〇〇回）

事實上，這也說明了在孔明六出祁山的過程中，這確實是次難得的追殺敵人的大好時機。孔明所述的蜀漢朝廷狀態，即是劉禪在位時，君臣關係的基本狀態，效忠的臣子無法得到君上的充分信任，孔明的後繼者姜維，即步上這樣的後塵。

孔明死後，孔明的傳人姜維接掌要務，君臣關係的惡化更為嚴重，其關鍵則不在為人臣子的失去了效忠蜀漢之心，而是領導者開始了人性的墮落，失去了原初的理想性，誠如中散大夫譙周所說：「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歡樂。」（第一一二回）因此，蜀漢的領導核心即是由一個荒淫無能的皇帝與貪圖安穩富貴的宦官所組成，這已迥非昔日可比。

蜀漢領導核心已不再是以「義」為核心的結合，而是以「利欲」、「享樂」為主的聚集，如此君主不明的領導核心，使得往後曹魏陣營與蜀漢對峙時，就曾利用了蜀漢的這項弱點，以「利」引誘環繞在蜀主劉禪身旁居核心的人物，使得姜維在作戰的關鍵時刻被蜀主召回。

由於劉禪對原初蜀漢集團的理想目標無心經營，使得蜀漢在天下場域所擁有的獨特性資本逐漸淪喪，雖然他依舊頂著「劉姓」此漢皇室之姓，然而，當東漢獻帝被曹丕篡立之後，劉備所標舉的恢復漢室名號的即帝位，仍要仰賴對「正統」與「仁德」資本的經營，但有著劉備不顧恢復漢室的大義，揮兵東吳為弟復仇，殘酷地以殺頭、萬剮凌遲等方式殺戮相關人等的「不仁」舉動在先，又有著劉禪安享帝王生活，無意恢復漢室標舉蜀漢為正統的狀況在後，使得蜀漢在「正統」與「仁德」的資本上，均已逐漸削弱了力量，而無法與其他集團有所區隔。在這種情況底下，蜀漢的競逐資本便只能仰賴有形的具有強大威嚇力量的武力、土地、軍隊等來展現，而在此類型的資本上，與曹魏集團相比，蜀漢是遠遠無法相及的。

蜀漢此領導核心的墮落與質變，可說愈演愈烈——「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於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第一一五回)，因後主的包庇，不僅姜維無力剷除宦豎，還被迫以圍田之法來避禍。蜀漢在天下場域中的位置，呈現了一個極矛盾的狀態，那就是因著君臣心志分途，使得蜀漢不僅失去了原初以「義」為上的人和狀態，以及具有政治理想的宣示資本，連進逼天下的可能姿態亦隨之而削弱。劉禪以高居皇帝之位，在重要時刻將在外領軍作戰的孔明與姜維召回，在長途奔波與兵疲馬困的狀況下，蜀漢的國力均已大受戕害。

如劉禪這般荒淫之君主，若在其他集團，則早已被其他有心之人取而代之了，在曹魏之國司馬師即曾以「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第一〇九回)這番說辭而將魏主曹芳廢除，由司馬師所述內容，可知一位君主若如此，實予人取而代之的最好理由，觀之蜀主劉禪即是這樣的一位皇帝，在失去了蜀漢，被俘虜至洛陽時，司馬昭即曾加以責之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應誅戮。」(第一一九回)，後念其早早歸降，而免其死，仍給予他住宅，童婢，及錦衣玉食的生活，在蜀樂聲中，劉禪仍仍嘻笑自若，毫無疚責傷痛之情，甚至因酒宴歡悅脫口而道：「此間樂，不思蜀也。」之語，如此之皇帝，連司馬昭都嘆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第一一九回)然而，如此之君主，卻在蜀漢集團中，享有了臣子對他的效忠，這不能不說是一極大的諷刺。

蜀漢集團由於在臣道上，依然維持並實踐著自興起以來的「忠義」精神與理想，所以，蜀主不僅沒有被廢、被篡立，而且還在君主之位上，以君主之權，將在外奮戰的將領召回。相較於曹魏集團的幼主託孤對象司馬氏，所做的一步一地奪軍權，挾制魏帝，並進而取而代之的行徑看來，蜀漢的臣道精神的展現，便

成了極強烈的對比；姜維在劉禪以受降之姿，向鄧艾投降後，還在與鍾會周旋，並一片忠心地與後主書：「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第一一九回）可真說是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精神的延續。蜀漢與曹魏在這個部分上的對比，說明了兩項事實，一是蜀漢領導核心的質變，恰成為蜀漢忠臣為一統天下目標的理想性實踐的毀滅力量，二則是蜀漢也因此而成為天下場域中，未發生臣子篡上擅權的唯一例外。

在天下場域中，當三個集團都稱帝之後，他們便逐漸地以武力以及所掌握的勢力來作為競逐的資本，集團內部更是如此，此處便突顯出了蜀漢集團自劉、關、張以來，所確立的忠義精神的最後堅持。雖如此，當蜀漢昔日能藉以宣示和進逼的資本與優勢喪失時，那堅持理想的蜀漢忠臣便只徒留下令人扼腕的悲壯身姿罷了！

從蜀漢領導核心的質變以及原有資本的喪失，吾人可轉而從攻入四川的鄧艾與鍾會身上得到另一角度的理解。

姑不論鄧艾與鍾會此二人爾後的相互爭鬥，以場域位置及資本的角度而言，當他們逐步接近四川的時候，就已實踐了蜀漢集團向來最獨特的資本形式，這和蜀漢那早已質變的領導核心兩相對照，實是一很好的對比。在鄧艾身上，即體現了劉備的謙遜仁德——鄧艾凡遇蜀中降將均待之以禮，並以安民為上，也因著他仁德為上的作風，使得「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第一一八回），另外在鍾會身上，當孔明托夢，令其勿使生靈塗炭，宜保國安民等囑咐後，他便隨即「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第一一六回）體現了鍾會不擾民的愛民作風，也因此使得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他的到來。

除此，在鄧艾身上，還體現了關羽的「忠勇」，例如在第一一二回敘述到姜維誤認鄧艾之子鄧忠，而與之相戰，戰到三四十回合不分勝負，爾後方知其僅乃鄧艾之子，心中不禁「暗暗稱奇」以此側寫鄧艾之勇猛。爾後他更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振奮將士，率領兒子鄧忠與諸將奮勇度了摩天嶺，使得四川官吏軍民均疑其從天而降，盡皆投降。除了有著「仁德」「忠勇」的特質外，鄧艾還有著如孔明一般深邃的「智謀」，例如小說即敘述到「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第一一〇回）。陳泰即曾對他嘆服：「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連姜維亦曾對夏侯霸說：「只恐鄧艾多謀，必先提防」（以上兩段引文均見第一一一回），這些原本都是蜀漢集團最引以自豪的資本，如今在兩相對照之下，更說明了鍾會、鄧艾等人最終能攻進四川的原因，以及蜀漢領導核心的質變所帶來的極嚴重的影響了。



## 四、外部勢力的入侵——利誘與武力的滲透

蜀漢在劉備手上國力大傷，在劉禪手上資本流失，這些不利的因素，使得曹魏集團有機可乘，外部勢力的入侵與滲透，使得蜀漢毫無招架的餘地，而一步步地走向滅亡。蜀漢位居地形十分艱險的四川，因此若不是自身的競爭資本有了變化，外部力量是很難入侵的，由於在天下場域中的曹魏勢力最強，所以，蜀漢與東吳一直維持著唇齒的關係，因此對蜀漢而言，外部勢力的入侵主要是就曹魏而言，事實上，曹魏也確實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方式來分別對此兩大集團下手。曹魏針對蜀漢朝局的變化，採取了兩項策略，一是利誘，二是以武力默默侵入，以達到由蜀漢內部瓦解的目的。而這也正是蜀漢幻滅的第三項重要因素。

蜀漢由於領導核心，已由義和特質轉而為利欲匯合，所以，當曹魏集團以「利誘」的方式侵入時，便成為有效的策略運用，因為，這會成為對蜀漢核心的腐蝕力量，能夠以此來有效地左右蜀漢的決策機制。前已言，蜀主劉禪信賴宦官黃皓，所以，曹魏首先派人「齎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第一一三回）由於姜維是繼孔明之後，集軍事謀略治國於一身的長才大將，所以若能削弱姜維的軍權，與分化他與蜀主之間的君臣關係，則會對曹魏的進一步進攻有莫大的幫助。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利誘方式的奏效，其前提是有「以利為上」的對象，之前即有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卻因阿附蜀主身旁的黃皓，而得重爵，又因此說黃皓奏後主，將姜維召回以替換成閻宇，所以，曹魏用利誘之計得以成功是一點都不意外的事。由此也知，曹魏一直密切注意著蜀漢國中的狀況與發展，鄧艾與司馬望就曾針對此而言：「君臣不和，必有內變。」（第一一四回）在劉備的時代，由於以「義」為上的人和連結力量十分穩固，所以，名利的誘餌始終未曾對這個集團發生過作用，如圍土山時，曹操的以百金錦袍名馬爵號以誘關羽，關羽的不為所動即可說明，當蜀漢的這項「義和」資本消失時，也正是「利誘」策略奏效之時。

前已言，姜維是蜀漢唯一令曹魏畏懼不敢輕忽的對象，原因乃在於姜維的深得孔明傳授，因此，曹魏準備選一智勇之士將其暗殺，但因著姜維困於蜀主的昏昧與宦官的亂權，被迫圍田避禍時，使得曹魏定然決計伐蜀，直接以武力來進攻。誠如魏中郎荀勗所言：「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第一一五回）雖然，蜀漢有著四川天險的自然屏障，奈何君主不明，軍力不足，軍師又被迫遠離成都，這些都是使得曹魏敢於深入其中的重要原因，誠如，總攬魏國大權者司馬昭就蜀漢之武力而言：

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圍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第一一

## 五回)

曹魏要能克盡其功，自然需要有優秀的人才，於是深明兵法之人大被重用，善曉地理的鄧艾及對用兵屢有高見的鍾會，分別率兵進攻蜀漢。再配合蜀主朝中的昏昧，誠如司馬昭所料：「蜀主劉禪昏昧，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第一一五回）拿下蜀漢就不是難事了。

隨著魏軍的出發，姜維即曾具表申奏後主劉禪，並提出規劃已定的守軍人選，但因宦官黃皓以「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說服劉禪無需信此，再以道婆巫術之言誑劉禪，使得他不聽姜維之言，任憑姜維累申告急文件，亦皆被黃皓隱匿，錯失了早先部防的大好時機，直到鍾會取了漢中，鄧艾在競爭心的驅使下，便立誓要取成都，以不讓鍾會專美於前，他以「立功名，得富貴」來激勵部將，遇峻危之處，便鑿山開路，搭建橋閣，以利軍行，鄧艾沿途下寨，直到摩天嶺時，均可見路途之艱險，當眾部將面對眼前無法開鑿的巖山峻嶺時，鄧艾便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第一一七回）之言表達必勝的決心，而眾將也以「願從將軍之命」傳達了相同的心志，當鄧艾直攻成都，各地告急表文紛紛而至時，蜀漢朝中仍一無覺察，因黃皓仍隻手遮天，一味以「此詐傳爾」之語來誑劉禪，蜀漢面對外來武力的入侵，不僅覺察時機晚，而且絲毫沒有招架的餘地，縱有一些忠義之士，仍無力回天，如奮死以戰的傅僉，被魏軍團團圍住時，仍仰天大嘆：「吳生為蜀臣，死亦為蜀鬼。」（第一一六回）而自刎身亡，其餘的守將，面對朝中昏暗不明、時勢已去，均往往有了投降的準備，如江油城守將馬邈所言：「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第一一七回）直到鄧艾攻佔了關鍵之地綿竹，戰死了諸葛瞻父子時，後主方才驚惶無措。

但縱使如此，劉禪仍不顧其父所創的基業，不顧第五子劉禎慷慨激昂的陳情：「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第一一八回）而準備投降，彼時鄧艾尚未進入成都，但藉由來探鐵騎口中，已得知成都早已立了降旗，不多久，張紹等人攜玉璽來降，蜀主正式將劉備所創的基業交出，不僅如此，更荒唐的是，他還派人去說姜維來降。

舉凡種種，均可見出魏軍之軍事力量雖勝過蜀軍許多，但因長途跋涉，當逼近成都時，魏軍勢力早已折損，僅餘千餘人。再加上蜀漢若有姜維軍自劍閣方向來攻，兩相夾擊，未始不能將魏軍擊敗。但領導人的昏昧，使得一幫忠義之士，無力回天，即連其子劉禎的力諫，也都被劉禪喝退，而在外賣命的將士，更是接獲蜀主已降的消息時，莫不咬牙憤慨「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第一一八回）魏軍在此有效地克服了四川天險，又看準了領導核心的腐敗，以致能順利地取得四川。

蜀漢由於從領導核心開始就缺乏了蜀漢原初理想實踐的動力，再加上原有的軍事力量本就不如曹魏，所以，即便有忠義之士的奮戰，面對曹魏入侵時亦無

力挽回，曹魏的入侵四川，以「利誘」先加快蜀漢內部的腐蝕，以「武力」則力克蜀漢的羸弱軍隊，重重地擊垮蜀將的士氣。

## 五、結語

綜觀蜀漢的幻滅，實可再從內部的劉禪的淪落，及不敵外部的現實勢力這兩方面來理解。劉禪的淪落，其實意味著走向了人性的墮落與真實，而先前的劉備時期，則彰顯了人性的、政治的理想與文化禮法，例如趙雲的以三大理由不娶趙範之美貌的寡嫂、關羽的對劉備妻的不逾禮，以及政治文化中的理想，如在文化中的理想之君主——仁德正統之明君，理想之臣子——忠勇智義兼具之文臣武將，理想之君臣關係——互重互信，以義相結不問利害，以及為理想奔赴的執著，直至戰死沙場方休等等。

這些劉備集團所彰顯的理想價值與珍貴資本，均隨著領導核心的淪落而傾頹，它的幻滅，可說是不敵領導核心劉禪的現實人欲，以及外部的現實勢力兩相交雜所發生的結果。當實踐理想的資本逐漸減少，而現勢的資本又不如人時，便注定了蜀漢集團終將一步步地走向滅亡，走向政治理想終歸幻滅的命運。

筆者深深以為，經典的可能詮釋空間是相當大而多元的，本文從一個大的視角及結構性的分析出發所做的詮釋，希望能提供吾人在經典詮釋與經典教學上的一個可能參考。

# **An Analysis on The Failure of Shu Kingdom from The Point of The Field and The Capital.**

**Yen-Mei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ey points in the failure of Shu kingdom in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First of all , Liu Pei insisted to attack Wu kingdom for the death of Kuan Yu, no matter how hard Kong Ming and Chau Yun tried to stop him. Secondly , the system of the value of Shu kingdom has changed after Liu Pei died. Thirdly , the power of Wei invaded. There three reasons resulted the fate of the failure of Shu kingdom.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ese three reasons in the point of the field and the capital. And we will research the change of the position of Shu kingdom in the process of the failure.

**Keywords :**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 Shu kingdom , field , capital , Liu Pei ,  
Kuan Yu